

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

車站遊覽啓示難忘

我在尚未入學的童年時期，中華民國那種欣欣向榮的中興氣象是值得留戀的；記得我還住在城中的時候，看到長（沙）常（德）公路通車後路過益陽的汽車，父親週末假期在家，常帶我到公路附近和火車站去散步，看到那風馳電掣的汽車飛奔而過，心中的好奇和嚮往之情不可言喻。

由於汽車速度縮短了空間的距離，許多過去從未見到過的東西和人物，都從遠方帶來，市肆商場顯著地在急速繁榮起來，小販、食物商店、小型戲院也在火車站附近如雨後春筍般地蓬勃發展。所以，去火車站遊逛，成了我城居時期的最高興趣和享受。

父親也很樂意陪我去，看到他望着汽車奔馳而去的眼神，現在回憶起來，我知道他一定有身困故鄉，志在遠方，甚至有虎落平陽的感慨。因為他平日和後來我隨他入學時，常常以「大丈夫立功異域，揚名遠方」一類的話期勉我，而對他已去遠方求學，後來學成爲國奮鬥的子弟，也時常表示無限的安慰和希望，要我效法。他有時也帶我到執教的龍洲師範學校去見識見識他的同仁和學生，都曾留下難忘的印象。

遷回千家洲故居以後，更是我生命中充滿着溫馨愉快記憶和不時引起我回憶的美好時光。事實上，這也是所有中國人民在安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中都能有的幸運。但以現在水準看來，那也只不過是文明社會或國度裏的人起碼的正常生活而已。但由於「內憂」、「外患」，使我和千千萬萬的同胞，連這一點起碼的正常人生活，也不能持久，實在令人叫屈和深深的悲痛。

安內攘外功敗垂成

內憂方面，依然是共產運動隱藏著的危機。雖然，如前業已提及的中共在江西推行的蘇維埃運動，已被圍剿，追迫局限於西北一隅，奄奄一息，只剩下萬餘殘兵敗將在掙扎；但其野心未死，欲圖捲土重來，不但仍舊高舉馬列主義大旗，蠱惑羣衆，並以抗日救國大義爲名，譴責國民政府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。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積極侵華的行動，同仇敵愾的中國人，幾無不受到中共宣傳影響而寄予同情。羣起叫嚷停止內戰，槍口對外，釋放政治犯等等。

從歷史和政治眼光來看，當時國民黨在蔣中正先生領導下先安內，再攘外的政策是符合民族和國家長期利益的。可惜執行此一政策的組織（即國民黨本身）不够健全。不但支持的羣衆中已爲社會惡勢力以及腐敗的地主資本家所滲透，甚至革命的陣營裏，也充滿着官僚、政客、反革命份子和中共的同情者。加以一般人民對國家大事的無知和短視，使「安內」（實係剿共）政策似乎成了蔣氏一人的獨腳戲，甚至把蔣

氏宣傳成了親日和封建派的首領。這一形勢的造成，自然是蘇聯和中共聯合努力的結果。

當中共以「槍口對外」、「抗日禦侮」等充滿着民族感情的口號作幌子與執政的國民黨從事鬥爭時，許多誠心愛國反日的人民、軍人、學者、作家都很容易直覺地走上反政府的道路而不自覺，置政府於被動的地位，那就是如果不停止剿共軍事抗日，便是反動。幾乎沒有其他選擇的餘地。

西安事變影響國運

影響安內攘外政策和國運最深遠的事，似乎要算民國廿五年（一九三六年）多發生的西安事變。那是當時身為國民黨軍政領袖的蔣委員長在西安視察督戰，企圖一舉消滅殘餘的共軍時，負責剿共軍事的將領張學良、楊虎城等受中共抗日宣傳影響，趁蔣氏輕車簡從到西安視察時，將其扣留軟禁，實行中國歷史上常見的所謂「兵諫」。迫請蔣氏放棄剿共軍事，釋放在押政治犯，準備聯合抗日。這些叛將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，尤其是張學良和他的部屬，大多是來自其東北故鄉，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被日本人趕出東北的流亡部隊，其眷念故里，痛恨日本的深摯情緒是值得同情和鼓勵的。但他這時不顧大局，以規持統帥要抗日的魯莽行爲是非法的、不負責任的，顯然是受到中共的煽惑和利用而不自知。說實在話，他們如果有守土抗日的志氣和勇氣，早在九一八事變時便應該充分表現，作出一點犧牲以示國人。然而，他們却採取了不抵抗主義。身爲土皇帝的少帥張學良，據說當時還在北京與女電影明星酣舞達旦。這種腐敗顛覆的

小軍閥，不知當時國人輿論何以竟然能容忍，當局也竟然依舊予以重用，使之獨當一面重任。

日寇侵華毛共感激

西安事變雖然不出兩週便以喜劇終場；蔣委員長脫險，由張學良護送返京，全國狂歡慶祝，鞭炮不停，鑼鼓喧天，顯示了中國人民的醒覺團結，和擁護最高領袖的狂熱。但這可急壞也激怒了侵略我國成性的日本軍閥，以爲吞滅中國此正其時，否則，中國便會在蔣中正先生領導下全民團結，不可再侮了。

奄奄一息的一萬多中共殘兵敗將，盤據延安山區，能以宣傳戰贏得如此重大的政治勝利，實在也得歸功於日本軍閥。後來中共建立政權以後，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向來華請罪的日本社會黨領袖表達了這點意思。他說：「你們現在不必向我表示侵華的罪愆了。事實上，我反要向你們表示謝意。因爲沒有你們日本侵華，便不會有我們中共的勝利，自然不會有中華人民共和國……」我相信毛講這話時是具有誠意的，不是開玩笑的，這也是很真確的歷史事實。

西安事變的喜劇終場，提早了日本的大舉侵華。事變後不到一年，中日全面衝突的序幕便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蘆溝橋揭開——是所謂「七七事變」。全民抗戰的熱忱，有如怒潮澎湃，歷八年堅壁清野，焦土抗戰，終於獲得亦悲亦喜，可憂可慶的勝利。這對國民黨和蔣先生來說，是「贏了戰爭，失了江山」，與戰時英國首相邱吉爾和他的保守黨一樣，領導英國打败了強敵，而戰後的第一次普選，人民却將勝利

的果實捧奉工黨。對中共來說，是坐享漁翁之利，雖怪毛澤東要感謝日本軍閥的侵華了。

政權轉移中英同異

戰後中英兩國領導抗敵勝利的政黨和其元首的改變，模式很像，但性質和方法却赫然有別，後果也迥然不同。英國是經人民投票選舉，沒有流一滴血、死一個人的民主程序，轉移政權。我國則是經由流血戰爭，死了六千萬人民，廬舍爲墟。至於後果，則更是嚴重多了，英國只是換了一個在朝黨和領袖，導致了若干政策的改變，但國家統一依舊，人民生活如常。而且不到幾年，工黨政策不滿於人民，保守黨又捲土重來了。而在我國是國家統一的破壞，人民生活的塗炭。何日再能統一復興，出人民於水火，登國家於衽席，建立制度，使政權的轉移經由「計算人頭，而不打破人頭」的和平選舉方式，以達長治久安的理想，則誰也不敢預測！

輕敵自腐大局糜爛

國家和國民黨原可以避免這一慘痛結局。但正如若干史家所形容的勝利後國民黨幹部中，不無被勝利冲昏腦袋的現象。除了最高領導階層未嘗沒有注意對日抗戰勝利的過早降臨，將使內憂倍難處理，大部份次層和低層幹部，都是狂妄自大，以爲強敵已屈，江山在握，美援可靠，破破爛爛的中共雜牌游擊隊伍

，還算得什麼。筆者便會聽到某軍事決策首長，一再大言將於三個月內肅清華北，半年內消滅中共的豪語。他當時也許有他的算法和信心，但其不察民心和社會真象，以及共禍與民心社會的根本關連，是不容置疑的。這種不能「知己知彼」，輕敵自大的將領和高級幹部，戰後非常普遍，但他們還不是造成國民黨失去大陸的罪魁禍首。真正的罪魁要算是那些「劫收大員」，和貪污腐敗、「天下爲私」的大員和小卒們；他們不擇手段地利用敵人投降以後，政府法令還來不及制定以憑處理戰後的各種社會、經濟和敵僞財產問題時，巧取豪奪，不顧國脈民命，大發其財；把領導抗日勝利，革命救國的國民黨形象破壞無遺，使民心喪失殆盡，予中共以可乘之機。這段公案，以及以後發展，不是一篇長文或一本小書所能道盡，也非作者寫作本書的主題。這裏僅僅是寫出一個序幕，搭一個舞臺背景，好讓我再回頭把我自己這個大時代的小人物，少懷大志的「半老徐郎」，所經驗的片段回憶，像戲劇一樣的，一幕一幕地推出。

我這早產難嬰據說曾替家庭帶來不少愉快，那也是當時鄉間的一種傳統觀念，認爲多子多孫是家庭興旺的象徵，或謂「福」氣。尤其在家道中落，或家門不幸時喜獲麟兒，更被認爲是否極泰來的先聲。加以農村經濟社會，人力便是財富，某家得子，便有獲得生力軍的感覺，蓋不數年便可在莊稼耕耘上扮演一個角色也。我祖父在自己備受農民協會凌辱，死裏逃生之後，對家中添丁，自然極爲興奮，加以反正後這幾年，父親教書工作順利，收入不惡，（當時一個中學教員大概年俸六、七百銀洋，而白米一百斤才二、三元，居家女傭才三、四元一個月。）老家千家洲社會秩序恢復，原有的些微田產，雖曾一度被「農民協會

「沒收充公，這時在官署衙門的清丈、調查清楚後也予以發還。除在城中購屋，以供我父母兄弟居住，以便父親工作外，祖父母和幼叔們便都從臨時避難的太平橋搬回了千家洲故居。」

一場虛驚喜劇落幕

離開太平橋時，我大概已四、五歲了。當時一般情形已不復能憶，但有一件事至今難忘；那是從太平橋搬到城居（益陽市上江街十四號）的那一天，因大人們都手忙腳亂，而我因土包子進城，一切都覺得新奇，於是隨意走出家門而未被家人注意，漸行漸遠，終於忘記歸路，把家人急得四處尋找，以為是被歹人拐走了。而我則在離家數里外的二堡地方哭泣求助，引起行人和警察的注意，一位警伯便拉了我的手，根據我說的方向沿門指認，流浪街頭達數小時之久，幸而在中途與家中派出尋人的親友相遇，一場虛驚，終以喜劇收場。祖父還把那警官請到家來，給了他一枚銀洋作為酬賞。

我的失而復歸雖然以喜劇終場，但給了全家一個警告，城中生活要比鄉間複雜，不但幼童如我者容易走失，而且行人車馬嘈雜，流氓地痞橫行，加以柴米油鹽蔬菜等等的需要，除一部份可由老家便中補給外，大部份都得現款購買，比鄉間之自給自足來得浪費。雖然父親的教書所得可以維持，但對我們小孩和母親來說，是得不償失的。於是在城中居住年餘以後，也都回千家洲故里歸隊，重返大家庭三代同堂的農村生活。父親一個人住入執教的龍洲師範學校宿舍，週末回家，走路也不過一個多小時行程，有時從校園碼

頭搭小舟（划子），沿資江順流而下，不到一小時便到達我家屋後的河洲，真是方便極了。

千家洲位於益陽縣城資江下游約十餘里之處，資江在這裏分出一股支流，叫蘭溪，繞出一個廿餘平方里的大河洲，在下游甘溪港地方又會合起來。這個河洲是幾百年前的湖床沖積地，土地肥沃，宜於農牧，且池塘棋佈，盛產魚蝦麥藕，為標準的湖鄉農村。由於四面環水，居民聯合高築堤防，以防春泛洪水侵入，祖父多年來便是堤務主任，其職責直接關係到全坑人民的生計和安全。

芭茅灘畔曹氏家族

我家便是在堤邊，運土奠基，建築了一棟擁有大小廿多間房室的四合院。屋後梅竹成林，資水溶溶，槳聲帆影，日夜奔流。前面是平疇無垠，荷塘柳色，點綴著鄰居屋宇，景致宜人，雞犬相聞。每逢春耕農忙季節到臨，農人扶犁叱犢，在泱泱水田中翻泥撒肥，播種插秧，農歌四起，布穀聲聲，一片昇平景象。接著便是欣欣向榮的夏季降臨，禾苗菜蔬都長得青蔥茂盛，迤邐一碧。整個大地，都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，真是「漠漠水田飛白鷺，陰陰夏木轉黃鸝」，充滿著詩情畫意。堤內是水田，堤外江邊更有一望無際的河土，名芭茅灘，每年春泛時雖不免短期被洪水淹沒，但水落後遺留下一層肥沃的沖積污泥，農人種雜糧、油菜、蘿蔔等於其上，各有所好，種類繁多，成本甚少而收穫輒豐，為鄉人樂於爭置之地產。芭茅灘良土萬頃，多為我曹氏所有，故人皆以芭茅灘曹氏稱我家族。芭茅灘傳統上是種植兩季，春種油菜，

夏植高粱。油菜花開時，一片金黃，綿延數里，蔚爲壯觀；高粱成熟時，紅頭綠葉，引人入勝，爲資江一景，過路船夫旅客，無不印象深刻。其他河土上的產物，以白蘿蔔聞名遐邇。其獨特處不但是水份含量特多，質潔味甘，營養豐富，且肥大如鼓，有人以誇大之詞形容其肥碩者，謂三國時，曹操率領八十三萬人馬下江南，路過吾鄉，軍糧無着，只吃了半個蘿蔔而別，其大可知了。這自然是沒有史實根據的胡謔。

下鄉歸隊神仙生活

芑茅灘曹氏自宋朝末年遠祖乾肇公始居河南長葛，十傳而至福海公，值明末大亂，輾轉流離，至益陽千家洲落脚。至我祖父值清末民初，雖其本人終生未入仕途，但對民國成立後的新潮流和時勢却有深刻認識，因而特別重視子孫教育，而寄以厚望。記得我從城垣下鄉歸隊時，大約已六、七歲，由於大家庭人多熱鬧，親戚朋友成羣，鄰里關係親密，質樸誠篤，守望相助，與城市中的彼此隔閡，互相提防，氣氛和感受完全不同。加上鄉村風光綺麗有如前述，我簡直好像到了天堂，一草一木，都對我有着一種吸引力。後來與同村同年的孩子和牧童們混熟後，更是海闊天空，無憂無慮，常常參加他們的隊伍，騎牛放牧，採蓮折菱，泛舟游泳，捕魚捉蝦。或在田園中除草種菜，騎馬放風箏，遛狗遛鳥，徜徉在大自然的懷抱，真是神仙生活。

祖父創辦興賢小學

這時鄉間還沒有公立小學和中學，我祖父便在我家附近的堤務辦公處闢室創辦一所興賢小學，由我的七叔成吉先生主持教務。成吉公曾在我父親執教的龍洲師範學校肄業，書法極佳，繪畫作文也很出色。開班後，附近學童都來註冊上學，約有三十人左右，採用新學制的課本，有國文、常識、算術、美術等門課。另由祖父開班按照老制教讀論語、孝經、大學、中庸、唐詩三百首等，提供了一個初學入德之門，替望子成龍的家長們也減少了不少憂慮和費用，因為那時最近的小學離家都有十餘哩，且必須住校食宿，對於初學兒童，實多不便。因之，許多人便因此不讓子女入學，貽誤一生。我就曾經被送入距家十餘哩的桃花崙信義小學，因年幼思家而中途退學過一次。所以興賢小學的創立，實在是祖父對桑梓的一大貢獻。

我在祖父和七叔的教導下進步很快，不但初小程度的基本知識都已具備，而且也學到不少經典古文，後來隨父親外出正式入校念書時，便是從三年級讀起。那時父親原是在洞庭湖邊的南縣執教，爲了我和三兄的學業，屈就受聘到縣立第七小學校教國文，可隨帶我和三兄入學。校址在離家十餘里的蘭溪小鎮，是前述資江支流蘭溪河邊的一個新興商業區，與我鄉千家洲隔溪相望。溪流曲折，水質清澈，不但盛產魚蝦，而且有舟楫之利。每逢雨季，我們常僱小舟自屋後河洲，循資江上溯數里，轉入蘭溪，容與中流，打槳而去，有如遊覽。

蘭溪近學校處有楓林港橋，爲巨石砌成，橫跨河面，聯絡千家洲與蘭溪市鎮，不但爲二地交通要道，且爲益陽十景之一。每逢節日假期，遊人甚多，或小立橋頭，憑欄遠眺，或泛舟游流於橋下。春夏課後黃

昏，常與同學悠遊其間，見少年游泳者，從五十呎高的橋欄跳水而下，以示其勇健，常贏得遊人不少掌聲。端午節龍舟競賽，尤為盛事，屆時鄰近各鄉鎮多派出代表和船隻前來參加，大顯身手。鄉民扶老攜幼，聯袂來遊，為農村樂事之一。

抗日戰起危機重重

這種寧靜愉快的農村求學生活，才過二年便受到「七七事變」的影響而醞釀着危機。雖然起初以戰事遠在天邊，並沒有顯著地改變社會秩序和生活方式，農民耕作如常，學校絃歌不絕。漸漸地，戰爭的衝擊從學生年齡的普遍上升和身材的高大而趨顯著。原來是由於戰事的需要，十七八歲的壯丁都要抽籤入營服兵役。但當時法律規定，在學青年可以緩役。於是許多過去並不算升學的青年壯丁，都一哄而擠入學校，以圖緩役。我們年紀正常幼小的同學替這些較我們高出一頭，有的甚至已結婚生子的高個子同學創造了一個名詞，叫他們「高射炮」。一方面也是因為敵人的飛機這時已在後方濫施轟炸，我方以高射炮防空制敵的緣故。這對他們顯然是一種侮辱和精神威脅，但他們受家長的安排，也只是一時忍氣吞聲了。

一心盼望成年入伍

但當戰局日益惡化，平津失守，京滬放棄，中樞退據武漢，然後遷都重慶，一連串的不幸事件發生後

，各地難民傷兵潮湧，以其親身遭遇和耳聞目見的日軍殘暴和野心，痛陳後方同胞。醉生夢死和置身事外的人，才漸感覺如同身受，而知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」之理。因而逐漸瞭解這是一場全民生死存亡的戰爭，並不是某一省、某一階級、某一黨派，或某一個人的戰爭。學校老師以此教育學生，家長以此訓示子弟，政府以此喚醒民衆，同仇敵愾，漸成共識。圖緩役、躲壯丁的人慢慢地少了，即不到兵役年齡的我們，也都已充分領悟「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」的道理。也有着「大丈夫當以守土衛國，立功異域，甚至馬革裹屍……」爲光榮職志。我因家中當時已有一叔（聖芬）一兄（霖蘇）離家遠走，積極參與了抗日救國的陣容，且受父親的耳提面命，一心盼望成年入伍，盡我國民一份子的責任。

日本侵華對中國人民所造成的災難和破壞，真是不堪回首和不可計算的。他們終於戰敗，幾至亡國的慘劇，也是天理所趨，或可說是一種懲罰吧！一九五三年，我以中國大學生代表身份去日本東京參加聯合國青年領袖講習會，曾被邀赴各大都市和農村參觀，見到被盟軍轟炸的斷瓦頽垣和失臂斷腿的傷殘軍民，想到戰時日軍在華暴行，日機狂轟濫炸，自己數度面臨死亡邊緣，同胞千萬死於非命的事實，不禁悲從中來，辛酸不能自己。

長沙大火怵目驚心

我個人對戰事的感受，除上述一切外，還有一樁難忘而駭人聽聞的事，是長沙大火。

當武漢棄守，中樞西遷，日軍爲迅速打通粵漢鐵路，迫我求和，乃以雷霆萬鈞之力，猛撲我湖南省。前曾提到，湖南不但是中國的穀倉，也是兵家必爭的戰略重鎮，而且民性强悍，勇敢好鬥，有中國斯巴達之稱；更由於清朝末年，同治中興時代，出了曾、左、彭、胡幾個人物，以及湘軍打敗太平天國的英勇事蹟，「無湘不成軍」這句話便不脛而流行全國。這四個人：曾國藩、左宗棠、彭玉麟、胡林翼，都是文武雙全，有思想、有學識的傑出人才，其中胡林翼更是我益陽縣同鄉，大家當然都爲他的功業感到驕傲。

日人妄圖輕取湖南，自然得付出相當代價。長沙三戰三捷、衡陽保衛戰、常德會戰等等，都是這種代價的一部份。這些事件發生時，正是筆者從小學進入初中的階段。除了從學校老師、家中祖父和父親的談話間風聞一二外，並沒有什麼特別知識。倒是第一次日軍渡過新牆河來犯長沙時，當時貪生怕死的省主席張治中命令軍警火燒長沙的事，至今記憶猶新。長沙爲湖南省會，距益陽約三百華里，有長（沙）常（德）公路相連，大火之時，黑夜中從益陽都可看到被火燒紅的半邊天，其慘烈和損失可想而知。後來日軍改變了攻擊目標，使張某火燒長沙的焦土政策目的落了空，對敵人沒有發生阻擋作用，對自己人民倒是災情慘重。中樞追究責任時，張某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，找了屬下幾個替死鬼，包括警備司令鄧悌、憲兵團長文仲夫，和省會警察局長（已忘其名）都被槍斃，以平民怨。這件事證明了張治中的顛預無能到了極點，也是抗戰期中大笑話之一。而張某長袖善舞，竊居高位，一直到大陸赤化後，又變節捧毛，成爲紅朝新貴，可說是中國官僚中的典型人物。

初嘗流亡學生滋味

我大概是長沙第二次會戰時從小學畢業進初中的，父親爲了便利我升中學，接受了當年聲譽頗隆的信義中學的聘書。信中原址是在益陽縣城對面，資江南岸的桃花崙——該地本是一片丘陵地帶，本世紀初，挪威、瑞典在華傳教事業勃興，選擇此地爲在華傳教中心之一，並設立學校，從小學以至大學，無不具備，長沙一次會戰後，由於敵人覬覦之心未泯，下二次大戰隨時可能發生，學校和教會當局爲了安全，乃把學校搬遷到資江上游離益陽三百里的山城安化東坪，我隨著父親和學校的船團，作了第一次遠別家園的旅行，也是第一次嘗到流亡學生生活的滋味。

資江是湖南流入洞庭湖的四水之一，所謂四水卽湘、資、沅、澧。資水長數百里，因上游流過崇山峻嶺，水勢湍激，以灘多水險聞名。溯江而上，可比美「蜀道之難」。像我們所乘的那隻船，載十餘人，却需船夫六、七人。在水勢平緩的段落，只需搖櫓推槳，便可蝸步前進。若幸遇順風，也可揚帆速行，如遇灘壩激流，船團的船夫們便得聯合起來拉繆，按序一船一船地拖拉過去。船夫躬着腰背，在陸地或山坡小道上攀援爬行的辛苦，回憶起來，真是不可想像。三百華里的行程，船行十日才到。如今乘飛機橫渡太平洋也不過十個小時而已，可見現代化與承古不化對人民生活 and 國家開發，盛衰強弱是何等的分別。雖我生長於資江之畔，戲水划船，捕魚捉蝦，爲童年難忘的生活情趣所在，但所認識的資江，只是其馴順和平的

一段，經過這次艱苦的旅行，才知道它有暴躁困人的一面。儘管如此，在船艙食宿，和團體旅行生活，都對我有一種新鮮的刺激和感覺。

由於每年乘船上溯有感，音樂老師何吉安曾作過一首「資江船夫曲」，流行一時，歌詞有云：「嗨呀呀嗨！嗨呀呀嗨！白天黑夜沒休息，太陽當頂火樣燒！冷也冷不了，曬也曬不了，我和牛馬一樣糟……」都是戰時生活的寫真啊！

在安化東坪的流亡學生生活，是我少年生活中重要的一環，也是以反應中華民族艱苦卓絕，克難奮鬥，不屈不撓的堅忍精神。儘管我們都是離鄉背井，年齡又小，而且也沒有逃出日軍魔掌的威力半徑，但我們竟能照常過著有秩序的學生生活，明恥教戰，弦歌不絕。且於課餘週末，在教師領導下從事救亡圖存，抗戰建國的宣傳和服務工作，信心百倍，無怨無尤。於今想來，真是可歌可泣。

熱血沸騰誓復國仇

在東坪一年很快地過去了，湖北戰局也稍趨穩定，學校便遷回桃花崙原址。這時是順流而下，三日便回到了小別的家鄉，心中的愉悅是無法描寫的。以後在桃花崙所過的兩年初中生活也是緊張而充實的。敵人的威脅時時存在，而敵機的轟炸，在第一年仍舊是很猖狂的，不但江城益陽的商業區曾被炸得滿目瘡痍，來往的船隻也常有船毀人亡的慘局。我們於課餘和勞作課時，都要荷鋤持鋤，在校園的山坡上挖掘

防空壕洞，一旦警報狂鳴，大家都嚇得魂飛魄散，以為末日將臨，向防空壕跑去，不一會兒，便可從樹葉叢中看到漆有可憎的血色太陽旗的日本飛機，從高空向縣城俯衝而下，接着便是轟隆轟隆炸彈爆炸的聲音，天崩地裂，恐怖異常。我們雖然有幸沒有嚐到「炸蛋」的滋味，但受驚和痛恨的情緒，常使我熱血沸騰，而在心中醞釀著一股同仇敵愾誓復國仇之志。

到第二年，也是我初中畢業的那年，敵機的轟炸已因美國空軍的助戰受到約束，顯著地沒有如過去一樣如入無人之境，狂轟濫炸，為所欲為了。但仍舊是隔不了多久，便來騷擾一番，有時與中美混合機羣相遇，我們便有扣人心弦的空戰實況可看，追奔逐北，精采異常。日機的隊形經常是品字成三，我機則二二成雙。有一次，當日機九架侵入我縣領空時，受到我機四架的迎擊，彼此糾纏追趕，忽高忽低，我們大夥兒躲在樹下觀戰，聽到機槍連發和我機小鋼砲的聲音，敵機二架中彈墜毀市郊，餘皆狼狽而逃。我機一架亦受創爆炸，墜毀於離校約五里的水田中。我們聞訊，結伴徒步去觀看。那時軍警還沒有趕到，只見現場一片零亂，機身支離破碎，首尾異地。駕駛員為一美國青年，亦粉身碎骨，手脚撕裂。我幼小的心中，曾為此悲痛不堪，不勝感慨。蓋其來自地球彼岸的美國，為捍衛我國領空和維護國際正義，英勇犧牲，碎身異域，其家人親友聞之，將何以堪？言念及此，不禁熱血沸騰，肅然起敬，淚涔涔下矣！

這時，我的長兄亦已從軍校畢業後，正充當連長服役於國軍第十一集團軍，遠戍滇西怒江前線，與從綸北來犯的日軍作戰，家父日夜為其安全而着急，蓋人為具有感情的熱血動物，所感不因國籍不同而異。